

「可能」推論會令人陷入思想泥沼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說過創造力是基於發散性思維（divergent thinking）：考慮其他可能性，在哲學裡面也有兩個類似的思維方法：「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和「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兩者的要點都是考慮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有時誤用「可能性」卻會把我們推進思想的泥沼。

幾年前，在一個網上論壇上有些人討論以巴衝突，我張貼了一篇文章，介紹碧姬·加百列（Brigitte Gabriel）所撰寫的書：【因為他們仇恨】。加百列是黎巴嫩的基督徒，她經歷了二十世紀末發生的黎巴嫩內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一九六零年代和一九八二年期間在黎巴嫩建立基地，在此期間巴解組織對該國平民施行暴力，造成黎巴嫩經濟不穩定和族群對立，加百列目睹了許多巴解組織的暴行。

其中一個討論者回應說：「你怎知道她所說是真的？也許她只是像某某人一樣作出不實報道。」加百列全家在穆斯林極端分子的迫害下吃了不少苦頭，她的男朋友被炸至死無全屍，在我看來，這種質疑對受害者是非常不尊重的。我明白以巴衝突是一個敏感和情緒化的話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立場，我尊重基於事實和邏輯推理的不同意見，然而，這種「可能」的說法困擾我。我回答說：「請原諒我不客氣，你有沒有讀過這本書？你能指出在書中那些具體的細節跟其他歷史資料有矛盾嗎？我可以隨意拿起任何一本書或任何一篇文章，稱這一點或那一點可能是不真實的。但是，如果我提出指控，那麼我需要同時提供證據，舉証的責任在指控者的肩頭上。」事實上，當我寫那篇文章時，我檢查過有關黎巴嫩內戰的其他資料。

最近，我又遇過類似的經歷。在偶然的機會下，我碰上一位對中國近代史上有濃厚興趣的中年男子，我建議他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閱讀蔣介石日記，我說蔣在日記裡面表達了許多深刻的反省。他說自己沒有看過那些日記，但他發表了自己的心理分析：「你怎麼知道他在日記中所寫是真實的反省？也許，他用寫作來做自我心理開解，和為自己辯護。」另一名在旁的男子問：「西安事變的真相是什麼？」我回答說：「張學良綁架蔣介石之後，他繳獲和閱讀蔣介石的日記，他發現蔣介石其實有抗日的意圖和計劃，這是他後來釋放蔣介石原因之一。」中年男子馬上反駁：「你怎麼知道這是真的呢？即使是今天報道的新聞也可能不是真實的，可能蔣介石那些抗日言論都是事後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郭岱君、楊天石對蔣介石日記都做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據我所知，沒有一人說蔣的日記是事後補寫的。好像以巴衝突一樣，蔣介石的是非功過人言人殊，我尊重基於事實和邏輯推理的不同意見，但這種「可能」推論卻難以令我信服。

我想強調的是，我並不是百分之百、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或稱許蔣介石，本文的主要論點不是在於哪個看法是正確的。我只是想指出，這種純粹猜測的思維出現在很多人身上，忽包括了受過良好教育和科學訓練的人！上面僅僅是很多個案的其中兩個例子。根據統計學和概率理論，所有事情皆有可能，幾乎沒有一件事具有零概率，有可能蔣中正被張學良捉拿之後，在日記中加插抗日言論，然後故意讓張學良繳獲日記。但是，你會將注碼押在一個非常低的可能性嗎？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人沒有說錯什麼，他們只是提出問題，他們沒有作出斷言，他們只是說：也許是這樣……。」讓我們返回發散性思維和的最佳解釋推理，在這些思維模式下，你應該考慮多種可能性，而不僅是一種可能性。當一個人提出一千零一個可能性的時候，這已經是一個斷言。這相當於某些國家的選舉只有一個候選人，這是獨裁，而不是民主。再舉另一例子，有人告訴我，某餐廳的菜色很不錯，我從來沒有在那家飯店吃過飯，但我馬上回應：「你怎麼知道這餐廳的廚師沒有用味精？也許有很多其他客人已經投訴該餐廳。」那家餐廳的菜餚味道鮮美，應該還有其他可能的解釋，也許店主僱用來自香港的名廚，也許餐廳所用的材料新鮮，龍蝦是由波士頓即日空運過來……而我只提出一種負面的可能性，即使我以問題形式和「可能」這些字眼去包裝自己所說，這明顯是一個指控。

當人們知道我是心理學家時，他們會問：「你知道人家在想什麼嗎？你有方法去探究人家內心深處嗎？」我的典型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別人想什麼，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做的。恰恰相反，心理學的訓練教導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心理學只是猜測，要猜的話，我需要考慮不同的可能性。」